

桐城派

研究



第十六辑

主办单位 ◎ 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

协办单位 ◎ 江苏雨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

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季羣林墨



相

她

派

元

年

中



桐城派研究

第十六辑

主办单位：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

协办单位：江苏雨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
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桐城派研究/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编. —合肥: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
2014. 8

ISBN 978 - 7 - 5650 - 1947 - 0

I. ①桐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桐城派—文学研究 IV. ①I207. 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98275 号

桐城派研究(第十六辑)

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 编

责任编辑 孟宪余

出版	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	版次	2014 年 8 月第 1 版
地址	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	印次	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邮编	230009	开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电话	总 编 室:0551—62903038 市场营销部:0551—62903198	印张	7.375
网址	www. hfutpress. com. cn	字数	185 千字
E-mail	hfutpress@163. com	印刷	合肥学苑印务有限公司
		发行	全国新华书店

ISBN 978 - 7 - 5650 - 1947 - 0

定价: 28.00 元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《桐城派研究》编委会

顾问 徐东平 严云绶 周中明

吴小国 朱宏 徐成志

名誉主编 胡睿

执行副主编 唐红炬

副主编 杨怀志 潘忠荣 方宁胜

编务 林亚敏

目 录

吴孟复先生论学术流变与治学	吴怀祺 (001)
论姚鼐的“以诗为文”	周中明 (021)
试析民国桐城派学者贾恩绂方志编纂的特点	许曾会 (052)
明清鼎革后方以智的身份认同	汪青 赖玉芹 (067)
张裕钊佚文掇拾	徐世中 (080)
莲池书院创新改革的沿承 ——以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的构想为例	樊 璞 (100)
近三十年辞典中“吴汝纶”词条述评	程大立 (108)
宁关自古循良心 ——记吴汝纶大师为官从政勤政廉政	胡堡冬 (123)
学行程朱之后 ——从接受史角度重论“桐城三祖”与程朱理学之关系	查金萍 (135)

桐城派应对文化冲突的文化心理	汪健萍 崔立中 (153)
一副楹联 两位大师的人生述怀	张梅生 (169)
高标立当世 流风法后人	
——方宗诚《柏堂师友言行记》管窥	
李国春 (177)	
严复、林纾译著的现代性曙光	张 恪 (183)
论桐城文化中的保民思想	张 元 (202)
安徽中国桐城文化博物馆主题内容探析	
唐红炬 (217)	

吴孟复先生论学术流变与治学

吴怀祺

家父吴孟复先生一生治学，著述颇丰。他留下的著作与文章，是我们文化的重要遗产，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古籍的整理与研究，对于研究传统文化，都有重要意义。先生学有渊源，深得学术要义，又不断开拓学术新境，其所著所论，反映一代学人振兴民族文化的心声。下面就学习先生的著作，谈谈几点心得，敬呈各位师友，以求教正。

学术融汇兼综的传统

钱仲联先生为家父的《吴山萝诗文录存》写的《序》大气磅礴、结构绵密，由近代学术大势，谈到学术发展之途径，示治学之轨辙。《序》文谓吴孟复先生的学术特点“是合皖江南北之长，果能善用以相济者矣”^①。

《序》文结合论述有清三百年皖江南北之学，倡导“学术不可无宗主，但必不可有门户”的正确治学途径，吴孟复先生师承渊源，正是接续这一传统，而又能发扬光大之。

皖学如果以长江为界，有江之北与江之南的分别，两者相异亦相通，诚如，钱先生的《序》开篇所说的：“清三百年间之治方术者多矣，而皖学为尊。南则休宁戴氏以考据著，北则

^① 《吴山萝诗文录存·序》，黄山书社1991年版。

桐城方、刘、姚，以文章雄。要其终，二者未尝不殊途而归。”

钱先生的话，很自然使我们联想到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论六家之要旨的话。

汉武帝时出现两种“学术汇于一”的途径。一种是从景帝以后出现一种倾向，董仲舒是代表，明确地要求用行政的手段来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他向汉武帝建议，说：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。今师异道，人异论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；法制数变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邪辟之说灭息，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从矣”^①。

和董仲舒不同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主张融汇众家之学，形成一种新的学说，说：

《易大传》：“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途。”夫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务为治者也，直所从言之异路，有省不省耳。

六家学术都有合理的地方，各家学术尽管不完全一样，却都是“务为治者也”。司马谈引《易大传》的话：“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途”，表明学术的发展，不是以一种学术去消灭另一种学术，以一种思想去代替其他各家的思想。百家学要“归于一”，却又不能以以前的某一家学术替代各家学术，而是融汇吸收各家之长，以形成新的学术。

在学术史上，汉代有今古文之争，南北朝时期儒、玄之争，两宋的朱陆之争，归结为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的分歧。明代的心学与理学之争，以及清代的汉学与宋学的对立。

^① 《汉书》卷五十六《董仲舒传》。

他们中间有的门户水火，严重对立。汉代的今、古文之争，各派为了使自己的学术立于学官，真是使尽各种手段；宋代的元祐、庆元时期的党禁，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议的范围。

学术流变与事物发展一样，也是盛中有衰，盛衰包含，及至末期，则流弊生焉。宋代朱陆水火，发展到后来则是朱学流于训诂，陆学流入禅。明初学术与朱学分不开，到了陈献章（白沙），学术发生变化，由陈白沙而王阳明，王学兴起，转而形成浙中王门、江右王门、南中王门、楚中王门、北方王门、粤闽王门诸派；泰州学起，学术出现“阳明先生之学，由泰州、龙溪而风行天下，亦因泰州、龙溪而渐失其传”^①。

在学术流变中，有主张学术融汇兼综者，而学术也于兼综融汇中得以发展，出现新的学术。南宋的学术是朱学也、吕学也、陆学也。吕祖谦代表的浙学，提倡学术融汇，是司马迁学术观念的发展。朱熹最不满意吕祖谦的地方，是因为吕祖谦“重史”，是他宗“太史公之学”，把“司马迁拾得不知大小”（朱熹语）。学术的融汇兼综，是在相互尊重、相互吸收的和谐的学术氛围中发展起来的，应该说，这是发展学术的正确途径，在众多学术中，能会通、融汇各家学术者，往往是学术活力的表现。门户水火，甚至为护门户而歪曲理论，不但于事无补，也使本身学术的道路越走越窄，封闭了认识，从而坏了学术之公心，坏了自身之发展。

兼综、会通、融汇，是我国学术史的十分重要的优良传统。明人王祎对当时学风之弊，有批评，说：“言道学者，以穷研训诂为极致，言文章者以修饬辞语为能事，各立标榜，互相排抵而不究夫统宗会元之归，于是诸公之志日微，而学术之弊，遂有不可胜言者矣”^②。

① 《明儒学案》卷三十二《泰学案一》。

② 王祎：《送胡先生序》，《王忠文集》卷七。

清代，万斯同和全祖望继承黄宗羲的思想，形成有特点的学术，阮元称之为“万全之学”。万全之学在学术史的意义，提倡一种学风，反对严守门户的陋习。全祖望明确指出：“夫门户之病，最足锢人”^①。章学诚论及浙东学术的价值，作了概括，成了经典的话：“学者不可无宗主，而必不可有门户”^②，是显示出学术正确途径。

吴孟复先生重皖学，他看到皖学中具有学术融汇兼综的传统。作为皖南之学的戴震，是汉学家，但戴氏也反对严学术门户。戴震说过：“由声音、文字以求训诂，由训诂以寻义理，实事求是，不偏主一家，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”^③。戴震推崇这样的读书法：“学者莫病于株守旧闻，而不复能造新意；莫病好立异说，不求之语言之间以至其精微之所存。夫精微之所存，非强著书邀名者所能至也。”^④所以在论戴氏之学，应该看到其特点：“东原之学，苞罗旁搜于汉、魏、唐、宋诸家，靡不统宗会元，而归于自得；名物象数，靡不穷源知变，而归于理道。本朝之治经者众矣，要其先之以古训，析之以群言，究极乎天地之故，端以东原为首”^⑤。

皖江以北的学人，如桐城的方苞，同样与重经世致用、学术兼综融汇的浙东学术相通。吴孟复先生从学术源流上论说方苞（望溪之学）同于颜（元）、李（塨）。这段话比较长，但可以见吴孟复先生的学术观念，有必要引录下来。他说：近数

① 全祖望：《杜洲六先生书院记》，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卷第十六。

② 章学诚：《浙东学术》，《文史通义》卷五《内篇五》，中华书局叶瑛校注本上册，1985年版，第523页。

③ 钱大昕：《戴先生震传》，《戴震全书》（七），黄山书社1997年版，第12页。又见《戴震文集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264页。

④ 戴震：《春秋遗传序》，《戴震文集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150页。

⑤ 王昶：《戴东原先生墓志铭》，《戴震文集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263~264页。

十年来，耳食之徒，目未尽睹望溪之书，竟以与“理学”、“八股”混为一谈，妄加贬抑；而不知理学之所以为世诟病者，以其“假以欺世”，“凡治财赋则以为聚敛，开阡陌边则目为粗才，读书作文则以为玩物丧志，留心吏事则斥为刀笔舞文”（《宋稗类抄》）。……夫理学之名，犹哲学也，其中派衍流分，得失不一。考之实际，则知望溪理学，实同颜（元）李（塨）^①。

先生又从学术交往上，从学术倾向上，从学术流变，详细论证这一点，因为这是在纠学术上长期存在的偏见^②。他指明：

颜元之学，以经世致用为旨，以“礼乐兵农”为重，以知行合一为归，近人指为实用主义，其一端耳。（方）望溪一则云：“古之治道术者，皆以有为于世也”（《循陔堂文集序》），再则曰：“所以备天下国家之用者，皆吾性命之理而不可以苟遗者也”，（《与某书》）即以礼乐兵农，经世致用也。故必“用心于物理之实”，而“于设施数变之故，皆究知其利害”（《过济宁别杨千木》）。此集中，《与顾用方》、《与德济斋》、《答陈可斋》、《与执政》、《与蔡太守》诸书，言河工、言救荒，言保甲、言屯田与设防、言察吏与防奸，委曲周至，实学实政，虽使颜李言之，未必能以到此，是岂空谈唐虞三代之理学家所能望其万一哉……

全谢山作望溪《神道碑铭》，力阐其“拳拳为斯世斯民之

① 《〈方望溪遗集〉序》，《吴山萝诗文录存》，黄山书社1991年版，第71~72页。

② 先生由《送宋潜虚南归序》说明，戴名世（潜虚）的学术交往；而望溪年二十四交王源。戴名世、朱书等人之交王源（或庵），大约皆由望溪。其后，望溪又交李塨，且与王、李两人易子而教。李塨撰《王昆绳（源）墓志铭》则谓：颜先生（元）之学，“由王而传，由方而广”。是李塨亦视望溪为颜李之传人也。晚岁望溪与颜、李始终无间。

心”，今观此集诸书，恺悌慈祥，叮咛反复，益见其用心之苦。

.....

总而言之，望溪治学，同于颜李；望溪论文，合于科学。此其所以冠冕一代，历久不磨；而世乃以一家一派视之，则测之浅矣^①。

吴孟复先生在《语言学论文集·序》及《方望溪遗集·序》中，论述清代学术的融汇传统，以方苞之学术为例，说：方（苞）氏之学同于颜（元）、李（塨），意在经世重民，全祖望谓“拳拳为斯世斯民之心”；而（方）望溪之文，异于时文。由此，他总结说：

总而言之，望溪治学，同于颜李；望溪论文，合于科学。此其所以冠冕一代，历久不衰，而世乃以一家一派视之，则测之浅矣。且吾闻之姚仲实师矣，师之言曰：“宗派之说，‘出于乡里好名者之私，而播于流俗人之口’，.....先辈公心，不欲示人以隘也。”^②

先生梳理了有清以来的学术传承，以为：

夫清文之盛，由清学之盛也；清学之盛，由求实与变新也。.....清初诸公既斥其弊，遂启新风。亭林之倡“博学”，黄唐之议君权，颜李之讲实践，田间、谢山之于史学，皆以实事求是之心，为经世致用之学，于思想既有启蒙之功，于文章亦开一代之盛。焦理堂云：“不学则文无本，无文则学不宣”（《家训》）。清初诸老之文，有本之文也。故不特度越元明，

① 《〈方望溪遗集〉序》，《录存》第72~76页，按，《录存》中的文章，后又收入《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》中（黄山书社2006年版），为避免重复，一般不重复注录。

② 《录存》第76页，黄山书社，1991版，

且非唐初欧阳、虞、宋初徐铉辈之所能及。

乾嘉之际，学趋专门（参看《观堂集林·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）然而，当时学术亦非止考据一途。戴东原之言理，本亭林“经学即理学”之旨，而推阐愈明。……

鸦片战争前后，志士仁人忧深思远，学术文章变化尤巨。安吴倡之，龚魏和之；湘绮、南海继之；太炎、几道异曲同工，以批判之精神，求改革之实效，或求之齐梁，或反之魏晋，或济以名理，或引入新知。咸同以后之文，庶其变而后大者乎？不特“少年《尊隐》有高文”，并“桐城”亦不得不变。……故清末之文亦远胜齐梁及唐宋之末。

三百年间，学风数变，文亦随之。虽各派各家，风格各异，而皆植根于学问，面向乎现实，既不徒为炳炳琅琅，亦不同于“空空妙手”，而世运之嬗递，学术之流行，文体之变化寓焉。^①

所以，钱仲联先生指出：“夫考据，乾嘉以来，魁儒硕师相传之家法，固治我国旧学业者必当植其基者也。然当乾嘉之世，学术亦不止考据一途。姚亦能考据，善执简以御繁，尤善审古人言辞往复之情，以得其旨外曲旨。而实斋章氏承梨州黄氏之学，微言大义，派衍浙东，阐明‘六经皆史’之说，不以考据鸣，更不以文章自刻饰，然亦为一代师儒之宗。夫果有休宁之学之识，……又何不可以治考据”^②。

如果说，梁启超、章太炎、钱穆诸位先辈对有清三百年学术史有过系统的总结，那么，吴孟复先生则是具体论述了皖江南北之学三百年的流变与发展，这对于理解先生的学术理念，乃至理解清学流变，都是十分重要的。

① 《〈清文举要〉序》，《录存》第49~50页。

② 《吴山萝诗文录存·序》。

这里我们可以体察到，先生是在提倡经世致用之学，在倡导学术兼综融汇的理念。

另一个问题是，关于“桐城派”的问题。桐城派在20世纪的学人中有争议。这一问题如何看，吴孟复先生与其师友一样，指出不能以“宗派”的眼光对待这一问题，应该有正确认识。先生尊敬前辈，说：“或曰‘桐城派’讲古文，姚先生又‘桐城派’大师，遂疑以此书（按，即姚氏的《文学研究法》）或未免‘宗派’之见，此点，先生于《宗派》一章中辨之详矣。先生既斥‘宗派’之说及‘出于乡里好名者之私，而播于流俗之口’；其著是书，更总诗文、兼骈散，何曾稍涉门户之见哉？”^①

对桐城派的理解要有开阔的视野，桐城派不只是“文派”，而且还是“学派”，又是“诗派”，“文”、“学”与“诗”三者相互为用，从这一视角讨论，就会有新解。他有几段话，值得思考：

——舒芜言：“文派”之外，更有“学派”；钱先生则谓“诗派”比之文章，似尤足重。孟复则谓：诗也，文也，学也，三者既区别而又相联系，学为之根，而诗为之华。何也？文直而诗曲，文之不能达者，诗可以宛曲达之^②。

——桐城文派是我国散文史上重要流派之一，原其发生于康雍之际，而绵延于近代现代，新旧嬗递，因革之际，其功过得失，自尤值得研究。所谓：

且也，研究桐城文派，其作用并不限于散文而已，更涉及思想史、学术史、语言学、文章学与文艺理论及诗歌诸领域。何以言之？

^① 《姚仲实先生〈文学研究法〉序》，《录存》第41页。

^② 《〈续枞阳诗选〉序》，《录存》第61页。

就桐城而言，不仅有一个桐城文派，而且还有一个桐城学派。从方学渐到方以智、钱澄之，在思想史上是颇有地位与影响的。方学渐在《明儒学案》中，列于泰州学派，即王学左派，这个学派在思想史上是具有启蒙意义的。方以智、钱澄之的思想就更值得研究。桐城文派与桐城学派之间有离有合；近年来已有人指出方苞与颜、李的关系，指出刘大櫆的进步思想，看来，过去那种简单地把桐城文派视为程、朱理学附庸的看法是值得讨论的；因而研究明清思想史，便不能不研究方、刘诸家^①。

总之，先生在治学中，遵循的理路是一条正确的路径，是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·浙东学术》中所强调的“学术不可无宗主，但不可有门户”，这也正是先生的治学理念。

作为安徽学人，他主张今天我们治学应当吸收皖之南北之学的精华，说：“今以望七之年，幸逢文明之盛，得见吾皖南北徽州、桐城两派之学之研究者日多，含英咀华，提要钩玄，庶几涵泓演肆，变而益大”^②。

先生更主张在治学上，更要中外兼综，要适应近代学科的变化，既要有专门之学，又要具有兼通融汇的学术气度。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，也是发展学术的要求。他说：

盖自乾嘉以降，学趋专门（王国维语），即原先统一之经学，至是分散为语言、文学、校讎、目录、史学、地学、天文、历算诸学科；降至清末，所分愈细，所诣愈精。姚先生家传诗文，学兼汉宋，又身值西方科学输入之际，师友中，复多兼通中西之人，以其家学、师传与心得，取精用宏，成兹巨著。因使文章之学，成为专门。此固时代趋势、学术发展之所

① 《〈桐城文学渊源考〉〈撰述考〉序》，《录存》第63页。

② 《〈桐城文学渊源考〉〈撰述考〉序》，《录存》第66页。

必然；然苟非先生之博雅，深造自得，亦必能臻于此也。^①

所以父亲继承发扬近代学术优良传统，在治学中也就能“合皖江南北之长”，这是逻辑发展之必然。

推而广之，20世纪以来，有一种观点，把中西之学作为两极对立、水火不容的学术，不但不符合学术的实际，也不利于学术的发展。兼综融汇的治学理念，就是到了新世纪，也是很有价值的。

“文献语言学”的实践与理论：学科发展的思考

近代学科不同于传统的四部之学，而每一门学科又与四部之学相通。同时，还要看到近代学科形成后，也还有一个学科变化与培育新学科的问题。这里，我们注意到他对“文献语言学”的关注，这是他在《训诂通论》中明确提出。该书的《绪论》是这样说的：

“我们要继承民族文化遗产，就必须充分利用古代文献；就要能读通文献语言，了解它的语义。训诂学就是研究语义的。由于它研究的是古书上的语义，所以又属于文献语言学”^②。

他重视训诂学的传统，同时，又在思考学科发展新的生长点，他把训诂学作为“文献语言学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先生看来，现代语言学与传统的经学中“小学”有联系，但又不是一回事，并由此再度谈到“文献语言学”。他说：

现代语言学一般分为三个部门：一是语音之学，二是语法之学，三是语义之学。……古今相较，可能看出：我国传统的

① 《姚仲实先生〈文学研究法〉序》，《录存》第41页。

② 《国学典籍阅读要义》，第155页。